

从
闭
关
到
开
放

李时岳 胡滨 著



从闭关到开放

——晚清“洋务”热透视

李时岳 胡滨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吴道弘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

从 闭 关 到 开 放

CONG BİGUAN DAO KAIFANG

——晚清“洋务”热透视

李时岳 胡滨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28,000 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950

ISBN 7-01-000248-7/K·131 定价 7.50 元

目 录

导论 洋务和洋务运动.....	1
第一章 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9—21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	9
第二节 太平天国战争和经世派的崛起	12
第三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外和好”	17
第二章 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	22—125
第一节 概说	22
第二节 几个典型局厂的剖析	27
一、江南制造总局	27
二、金陵机器局	40
三、福州船政局	48
四、天津机器局	83
五、山东机器局	94
六、湖北枪炮厂	110
第三节 军事工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	118
第三章 洋务派倡设的民用企业	126—261
第一节 概说	126
第二节 几个典型企业的剖析	130
一、轮船招商局	130
二、开平矿务局	159
三、电报总局	182
四、汉河矿务局	204
五、上海机器织布局	214

六、湖北铁政局	231
第三节 关于官督商办企业的几点考察	249
第四章 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	262—309
第一节 早期购买船舰的活动	262
第二节 筹议海防和设立海军	272
第三节 洋务派建立的四支水师	292
一、广东水师	293
二、福建水师	295
三、南洋水师	297
四、北洋水师	298
第四节 有关近代海军的几个问题	304
第五章 洋务派兴办的教育事业	310—349
第一节 概说	310
第二节 几所典型学堂的剖析	315
一、北京同文馆	315
二、上海广方言馆	321
三、求是堂艺局	324
四、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	328
第三节 留学	331
一、幼童赴美留学	331
二、船政学生留欧	338
第四节 洋务学堂与科举制度	344
第六章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350—382
第一节 概说	350
第二节 几次大争论的剖析	354
一、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354
二、关于制造轮船的争论	361
三、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368
第三节 洋务派和顽固派斗争的性质	379

第七章 洋务思想	383—412
第一节 概说	383
第二节 关于洋务思想的几个问题	394
一、爱国和卖国	394
二、官办和民办	399
三、君权和议院	403
第三节 中体西用的历史考察	407
结束语 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413
附录 征引书目举要	427
后记	433

导论 洋务和洋务运动

“洋务”一词从“夷务”演化而来。中国古史上的“夷”，或专指居住中原以东的夷人，或泛指华夏而外的四方异族，都属于贱称，含有尚未蒙被文明教化的意思。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扩展了，这些来自远洋的异邦人也被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之类，而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往往又缀以“洋”字，如“洋钱”（指银元）、“洋药”（指鸦片）之类。“夷”固属贱称，“洋”也并不高贵。“夷”“洋”之间本无高下、褒贬的区别。随着海外交通的日渐繁盛，道光年间，开始流行把对外贸易、交涉等事务统称为“夷务”，但鸦片战争前后也有使用“洋务”这个词的，如1839年7月御史骆秉章奏中就有“把持洋务”句，1840年7月御史陆应谷奏中又有“于洋务不无裨益”的话。^①

称来自远洋的欧洲人为“夷”，自然反映了“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等自尊自大的传统观念。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因苏松太道吴其泰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字样，便曾上书抗议，说英国“不是夷国，乃系外国”，称“夷”是对他的“凌辱”。吴其泰复函改“该夷”为“该商”，含糊了事。^②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怀着征服中国野心的英国侵略者表示再也不能容忍用“夷”来称服他们了。在1842年的议和谈判期间，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对清政府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等人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91、323页。

② 许地山：《达衷集》，第49、51—53、59—60页。

勿再用。”当时在场的前吉林副都统咸龄搪塞说：孟子曾经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载于古代典籍，有何不美？这段话反映了颟顸的清朝统治者在战败之余还想在文字上维护“天朝体制”、死争面子的恶习。英国方面坚持不肯撤销原议，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①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以及后来的有关照会中，没有出现“夷”字，而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酋”、“夷商”、“夷务”等字样仍继续通行。1858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当地官厅屈从于侵略者的压力，“讳言夷务”，公开以“洋务”或“外国事件”代替“夷务”。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对此大为不满，曾上奏朝廷，特意在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借以抵制“洋务”新词的流行。^②但是，过了几个月，在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便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③侵略者的意志在炮口下变成了条约的条款。同年10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见到《邸报》所载“上谕”中有“夷船闯入天津”字样，指责清政府违背条约。清朝钦差大臣桂良等一面备文照复额尔金，答应“嗣后仍当照约办理”，一面上折请求凡由军机处发出有关“夷务”的文件，“飭令毋庸发抄，以昭慎密”。^④反映出一副无可奈何、苟且应付的窘相。从此，有关“上谕”中“夷”、“夷务”字样遂被“洋”、“洋务”等词所取代。清朝一些官员也自动改变用词，从专用“夷”而“夷”、“洋”掺用到全用“洋”字，逐渐完成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演化。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和认识，明智之士也有较早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38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812—813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2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531页。

地自觉抛弃对别国、别民族不够尊重的习惯用词，并主张在对外文件中避免使用轻蔑字眼的。魏源的《海国图志》虽然沿用“夷”字称呼外国，但他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不仅承认外国有“长技”，而且主张向外国学习，称“夷”就不再具有原来的那种虚骄之气和轻蔑意义。后来，他点定《道光洋艘征抚记》时，便把起初所用的“夷”字一律改为“洋”字。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写道：“凡于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之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①重实效而不徒逞口舌，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自然，抱残守缺，绝口不谈“洋务”，始终坚持“夷夏”之大防者，直到光绪年间也仍然大有人在。分朝编纂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道光朝的编于1856年（咸丰六年），咸丰朝的编于1867年（同治六年），同治朝的编于1880年（光绪六年），都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就是明证。不过，这只能看作历史惰性的表现，比骆秉章在1860年便径将别人旧作《英吉利夷船入寇记》改题为《洋务权舆》，其态度的差异实不可以道里计。

总之，“夷”“洋”二字的替换大体上确定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洋务”代“夷务”，既是“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动摇和破灭，又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既有被迫接受的恼恨，又有向前挪步的足迹。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轫的。

如果说，“夷务”和“洋务”是同一概念的递嬗；那末，“洋务”和“洋务运动”则为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夷务”或“洋务”最初专指外交，所谓“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②重点在于对外通商、议和等事务。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或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528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11—12页。

“总署”),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设的外交机构,有人称之为“洋务衙门”。^①后来,随着和洋人交涉的事务不断增多,“洋务”所包括的内容也不断扩展,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被称为“洋务”,设立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也被称为“洋务”,1884年张之洞在山西太原特设“洋务局”,访募的人才包括“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②几乎囊括一切西学。而且,根据“弱国无外交”的认识,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图富强,还被认为是办好“洋务”的根本。洋务政论家王韬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③盛宣怀转述李鸿章的意见说:“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④所谓“借法”,主要指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于是,这种“借法自强”的“洋务”又被称为“时务”。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⑤陈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⑥更有人主张把属于外交的“洋务”和属于内政的“洋务”区别开来,声言“窃慨近数十年来,吾国家柔怀远人与富国强兵之计,均目之曰‘洋务’,其称名已不正。”^⑦还有人干脆只承认富强之计是“洋务”,如把李鸿章在1863年奏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事,说是他“创办洋务之始”,^⑧前此的购买洋枪洋炮、“借师助剿”等等都不算是“洋务”。为了把“富国强兵”的内政设施和“怀远招携”的外交活动区别开来,历史学家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一),第288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89,公牍4,第23页。

③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33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卷首,第50页。

⑤ 《韬园文录外编》,第25页。

⑥ 陈炽:《庸书》外编,第5卷,第4页。

⑦ 经元善:《居易初集》,第2卷,第43页。

⑧ 《清史列传》,卷57,第2页。

把清朝部分官员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事的“富强之计”：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建设海军舰队等等“借法自强”的种种措施，概括为“洋务运动”。这是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借取西洋新法，排除种种困难和阻力，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长期持续的努力，又称“自强新政”。倡导和推行“自强新政”的清朝官员遂被称为“洋务派”，以区别于那些反对“自强新政”的顽固派。

因此，“洋务”一词的内容很广泛，重心在于外交；“洋务运动”一词则有所专指，不包含一般外交活动而基本上属于“富国强兵”的内政范围。自然，作为一个时期的历史重心，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必然和清朝外交及其他内政如治安、财赋、仕途等等有所关联，也必然会对清朝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发生影响。这些关联和影响可以而且应该加以考察，作为评论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外在因素。但关联和影响毕竟不是运动本身，内容和外联不能没有界限。否则，研究的对象就会漫无边际而不可捉摸。

从对外关系而言，洋务运动可说是被迫开放下的主动引进。被迫开放，不能不伴随着欺凌、屈辱；主动引进，则意味着发愤图强。二者性质相反，但却交织在一起，而且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就造成了难以辨析的复杂现象。长期以来，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原因盖在于此。在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正在产生新的经济（资本主义）和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研究洋务运动，就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它和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关系如何？加速还是延缓？说明它和新经济、新阶级的产生关系如何？促进还是阻滞？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是怎样迂回地向前发展的？有哪些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

历时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约十年,以创办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为中心,是洋务运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约十五年,除继续创办军事工业外,更大力兴办民用企业,重心转为“求富”,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约十年,新企业的创设不多,旧企业的矛盾暴露,主要成就为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衰微阶段。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公车上书”为标志,洋务运动遂让位于维新运动,洋务派经营的企业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不成其为运动了。

在洋务运动时期,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聚集在“借法自强”的旗帜之下,有的倡导,有的响应,有的从事言论鼓吹,有的从事以军事、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旁及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确实是个颇具声势的“运动”。参加运动的人自然很复杂。初期,主要是略知世界大势、感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要求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和在实践中真切领会到西方确有所长、采纳前者建议而付诸实施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主持者。当时,封建顽固势力相当强大,讲求洋务的人被顽固派视为“丧心病狂之徒”、“寡廉鲜耻之辈”,饱受“社会舆论”的攻击。1873年李鸿章在致沈葆楨的信中十分感慨地说:“鸿章涉历洋务已十余年,尝苦有倡无和。”^①郭嵩焘任驻英公使时致函李鸿章说:“往与宝相(崧)论今时洋务: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葆楨)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②可见够得上洋务派的人是很少的。从七十年代后期起,“洋务”渐成时髦。一方面风气渐开,“借法自强”的号召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并随着洋务事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309页。

业的开展,洋务派中出现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管理人员;另一方面由于参与洋务的人可获得肥差美缺,又有每隔三年保举升迁一次的机会,于是人们纷纷“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①于是,厕身于洋务活动中的人日益庞杂,茫然无知、谋求衣食者有之,“素于洋务隔膜,而又假充内行”^②者有之,表面附和、实则反对者也有之。这些人虽然参与了洋务运动,当然不能算是洋务派。

洋务派内部的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军政要员还是上层的封建统治者,立足点还是封建主义,但他们或多或少、或先或后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倾向。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地位不同、认识不同、利害不同,彼此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和矛盾。仅就首脑人物来说,中央的奕訢和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间有矛盾,曾、左、李之间有矛盾,老牌的李鸿章和后起的张之洞之间又有矛盾。奕訢是洋务派的最高领导人和最大支持者,但他除“坚船利炮”外,对其他洋务事业兴趣不大,对内政革新比较保守。为了防止出现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他曾经企图让满洲贵族控制军事工业、特别是军火生产。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奕訢却要求李鸿章“酌派该局熟练之员,带领匠役器具,由轮船赴津开局。”^③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也由于满洲贵族中缺乏能干的人才(奕訢最初寄希望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崇厚太不争气,扶不起来),由中央、满洲贵族直接控制军事工业的意图未能实现。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始人和奠基者,但他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迈出一小步,又仅仅参与了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活动,思想中保守的成份比较浓厚。他一方面主张大力购

① 《韬园文录外编》,第32页。

② 李鸿章评闽浙总督何璟语,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33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第54页。

买、仿造西洋船炮，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最新式武器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在他的影响下，“湘军旧将扭于成见，不以洋人后膛枪为然，无论如何开导，终不见信。”^①因此，湘军在军事装备上远远落后于淮军。左宗棠虽属湘系，但和曾国藩龃龉甚深，和淮系首领李鸿章的矛盾更大。他长期用兵西北，为收复新疆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中法战争期间也曾亲往福建海疆督办防务；但在洋务方面的实际经历不多，见闻不广，他的洋务思想也是比较保守的。李鸿章是洋务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创办的洋务事业最多，主持洋务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对内政革新的态度，都超越了曾、左；但他对外一味恐惧妥协、避战求和，并因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受时人和后人诟病。张之洞是清朝朝廷为防止李鸿章势力过于强大而大力扶植起来的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他有见识，有魄力，但办事疏阔，处世圆滑，又处于洋务运动走向衰败的阶段，创建了不少企业却大都成效甚微，并难乎为继。总之，洋务派是个很复杂的政治派别，相对于顽固派而言，它有共同的主张和倾向，而内部却又派系不少，差异很大，矛盾重重。因此，研究洋务派，既要看到它的共性，又要看到它所属成员的个性，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必须指出，这些洋务派的首脑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要员，除了主持洋务运动，他们还都承担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国务活动，诸如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战争与媾和，等等。评价某个人物，自然应当全面衡量；评价洋务运动，则不能把洋务派所从事的和洋务运动无关的其他国务活动统统算在洋务运动的账上。

^① 《洋务运动》（六），第250页。

第一章 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

近代的开端，曾经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无情地破坏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解放生产力，使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它尚未取得统治的地方，迫使一切民族在严峻的形势下作出抉择：或者败灭，或者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分早晚，毫无例外。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先后取得了统治，海外殖民事业从而获得更为强有力的推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①落后民族从而大吃苦头。非洲的黑人被贩卖为奴隶，美洲的印第安人则濒临灭绝，英国人向印度广大腹地推进，廉价的英国商品把印度手工工人置于死地。杀戮、奴役、压榨、盘剥，火和剑在全球飞舞，血和污在大地横流。出路只有一条：仿效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①

几千年发展迟滞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欧美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欧美资产阶级的冒险家们曾经不断叩打着中国的大门，但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落后终于挨了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57—1860年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堂堂天朝上国竟被外来“小夷”打得惨败，乃至京师沦陷、皇帝“北狩”。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迫使人们思索：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应该怎么办？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② 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林则徐认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③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具体建议在广东虎门外创建造船厂、火器局，聘用西洋工匠，以期“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设想造船厂除造战舰外还可以造轮船，火器厂除造枪炮弹药外还可以制造“借风力、水力、火力”的各种“有益民用”的“西洋器械”。^④ 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訢等纷纷主张“讲求洋器”，并着手兴办仿造洋枪洋炮和西洋船舰的军事工业。为了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曾国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1页。

③ 《林则徐书简》，第188、189、197、201页。

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

提出“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思想，^①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都主张“振兴工商”，李鸿章说：“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②为此，洋务派致力兴办了一系列“保利源”、“敌洋产”的工矿交通企业。所有这一切，首先都应看做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所做出的反响。从中国本身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属于外力，是偶然的；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冲击又是必然的。这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因。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策动的，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根据是1866年清政府曾密谕各省督抚大臣讨论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其实，赫德和威妥玛先后向总理衙门呈递说词，建议中国举办近代工矿业及交通运输业，目的显然是欺中国贫弱，企图越俎代庖以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讨论中，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等都看出了这种阴谋，于是主张募雇洋匠，购置机器，自己兴办，以期“权操诸我”。^③显然，这是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工矿交通的抵制，怎能说成是“按照英国侵略者定下的调子在跳舞”呢？李鸿章在兴办工矿交通企业时一再强调，目的在于“开发利源”和“免致外人覬觐”，“杜外人覬觐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之气，使之废然而返。”^④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事实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9，第45页；《洋务运动》（一），第155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3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3，第6页；卷54，第2页；卷55，第16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42页；奏稿，卷45，第32页；奏稿，卷39，第23页。